

# 马克思幸福观的三重意蕴

庄忠正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摘要:**虽然以往的哲学家都曾探讨过幸福的概念问题,但是,马克思把现实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引入了幸福范畴。这三个原则不仅使马克思的幸福观实现了革命性转变,把人们的幸福从天国拉回了人间,要求实现人们的现实幸福;而且为人们提供了实现现实幸福的有效途径,即通过“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实现人们的“相对之绝对”的现实幸福。

**关键词:**马克思;幸福观;现实生活世界;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3-0005-04

纵观整个哲学史,可以看出,不少哲学家都曾探讨过幸福的概念问题,但问题在于,这些关于幸福的理论往往并未给人们带来幸福,甚至使人们对幸福更加困惑。对此,康德对传统的幸福观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在他看来,传统的幸福观之所以使人们对幸福更加困惑,就在于以往的哲学家过于自负,没有把理性原则引入幸福论范畴,过于凭感性来处理幸福问题。其实不然,造成幸福困惑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幸福观始终无法解决幸福理论与现实生活、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之间的矛盾。针对于此,马克思在对传统的幸福观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把现实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引入了幸福范畴。这三个原则不仅使马克思的幸福观具有了独特的哲学意蕴,成为一种科学的幸福观;而且使其实现了革命性转变,把人们的幸福从天国拉回了人间,解决了造成幸福困惑的矛盾。

## 一、现实性原则——回归现实生活世界

传统的幸福观之所以无法解决幸福理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就在于它们是一种纯粹概念意义上的幸福观,所寻求的“幸福”只是一种本体论式的承诺。与此相反,马克思把现实性原则引入了幸福范畴,奠定了其幸福观的现实基础——现实生活世界,把人们的幸福从天国拉回了人间。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

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sup>[1]10-11</sup>这一“现实前提”不仅构成了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且把马克思哲学与以往的哲学区别开来。当然,马克思所谓的“现实的个人”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与社会绝缘的原子式个人,而是“社会存在物”、“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这种“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构成了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即现实生活世界。所以,确切地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现实生活世界为其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不可否认,以往的哲学也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但它们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马克思哲学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因此,马克思的幸福观与传统的幸福观有质的区别,它回归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要求实现人们的现实幸福;而且我们只有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幸福观的真实意蕴。针对马克思的幸福观这一革命性转变,我们可以通过分析马克思的文本来加以考察。

学界一般把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和《博士论文》视为其幸福观的萌芽;虽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他已经明确提出了哲学必须积极对待现实的原则。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开始日益重视现实社会问题,并且已经意识到社会现实生活是第一性的东西,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源。这种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关

收稿日期:2013-04-10

作者简介:庄忠正(1987—),男,河南睢县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注现实、研究现实,进而批判现实。在《德法年鉴》工作时期,马克思对现存的一切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但是马克思的“批判”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根本不同,他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sup>[2]416</sup>,实现“新世界观”的变革。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它是马克思的幸福观从萌芽到确立的关键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宗教批判仅仅是社会批判的前提,人们需要从宗教批判转向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既然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那么我们就需要废除人们虚幻的宗教幸福,去实现他们的现实幸福。然而,在这个颠倒的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现实幸福只是一种空想,根本无法实现。因此,在宗教批判揭露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使人们建立起了自己的现实性以后,我们还需要“揭露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把“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sup>[2]212</sup>。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人们的现实幸福,我们需要从宗教批判转向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即“向德国制度开火”,“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sup>[2]19</sup>。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揭露出人们的现实幸福无法实现的根源——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特征,它不仅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且使人得以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进而按照美的规律构造自身。但是,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的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异化成了维持其肉体生存的手段,人们在其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sup>[3]54-55</sup>。换言之,异化劳动已成为现实生活世界中使人们失去自由、造成人们不幸的“必然性”;它使人们在摆脱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之后,又陷入“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不仅如此,异化劳动还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而后者正是一切颠倒的社会关系赖以生存的土壤。所以,为了获得现实自由,实现现实幸福,人们必须从根本上扬弃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异化劳动,重新获得人的类特征——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只有描绘出能动的现实生活过程,并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进行研究,人们才能解决造成幸福困惑的矛盾。“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sup>[1]17</sup>这里所

谓的“人间”就是指“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处的现实生活世界。但是,在此“人间”中,“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sup>[4]30</sup>因此,在这种由“纯粹的金钱关系”和剥削关系所笼罩的“人间”,人们的现实幸福是无法实现的。尽管如此,马克思呼吁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sup>[4]49-50</sup>,推翻一切颠倒的社会关系,建立合乎人性的、使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自由的人才能成为可能,人们的现实幸福才能得以实现。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幸福观实现了革命性转变,它把人们的幸福从天国拉回了人间,它不再是一种纯粹概念意义上的幸福观,而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要求实现人们的现实幸福的幸福观;而且马克思所谓的“现实幸福”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本体论式的承诺,而是一种只有通过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性实践才能实现的现实幸福。

## 二、实践性原则——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性实践

既然马克思的幸福观把人们的幸福从天国拉回了人间,那么,人们的现实幸福又如何实现呢?这一问题便涉及马克思哲学的另一核心概念——实践。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sup>[3]388</sup>;即人们要解决幸福理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实现自己的现实幸福,就必须诉诸于“人的实践力量”。众所周知,人的实践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式的生活动,它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它不仅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且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sup>[5]501</sup>,“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必须……生产物质生活本身”<sup>[1]23</sup>。换言之,作为“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类存在的第一个前提,而且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只有通过这种实践活动,人们才能创造历史,实现其全面发展。所以,人们要实现自己的现实幸福,就必须付诸于“人的实践力量”——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实践活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明确

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sup>[3]57</sup>也就是说,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就在他的生命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而且这种生命活动是人的类特征。此外,人只有通过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实践活动)改造客观世界,使之成为属人世界,人才能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当然,人的这种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是按照美的规律(合目的性和规律性)进行的。对此,列宁指出,人通过“为自己绘制客观世界图景的人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现实。”<sup>[6]187</sup>所以,以实践活动为其类特征和存在方式的人类总是要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把理想变成现实的理想,即把现存国家、社会改造成合乎人性的、使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的现实国家、社会。就此而言,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活动正是人们的现实幸福得以实现的前提。然而,以往的哲学家却忽略了实践原则在幸福范畴中的重要作用。

在对传统的幸福观进行批判性审视时,康德曾把造成幸福困惑的原因归于以往的哲学家过于自负,没有把理性原则引入幸福论范畴,过于凭感性来处理幸福问题。其实不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包括康德本人)没有把实践原则引入幸福范畴,导致幸福问题的神秘化。对此,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批判传统的幸福观,即“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sup>[5]499</sup>同样,传统的幸福观的症结就在于它只是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幸福”,而不是把其当做实践去理解;所以,在它们那里,幸福不仅缺乏现实的根基,成为一种纯粹概念意义上的本体论式的承诺,更是一种与人无关的神秘的“物自体”。但是,“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5]501</sup>。如果我们把实践原则引入幸福范畴,必然会使幸福问题摆脱神秘的外衣,成为与人切身相关的现实问题。这样的话,幸福就不再给人们带来困惑,而是促使人们通过他们的实践活动去追求自己的现实幸福。

既然如此,实现人们的现实幸福的实践活动又

是如何展开的呢?我们知道,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完全由“纯粹的金钱关系”和剥削关系所笼罩着,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毫无幸福可言。但是,以实践活动为其类特征和存在方式的人类绝不会满足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异化的社会里,而是要它把改造成合乎人性的、使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的现实社会。因此,人们必须向现存的剥削制度、旧的生产关系开火,“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sup>[2]9</sup>。具体而言,这一现实革命不但要针对现存制度,而且还要针对黑格尔哲学,因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sup>[2]7</sup>。然而,要实现这种现实革命,推翻一切颠倒的社会关系,就必须“集中于只用一个办法即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上去”<sup>[2]8-9</sup>,即把“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结合起来。所谓“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分别是指创造新世界的革命行动和革命理论;二者既不可分割也不可相互替代。所以,为实现人们的现实幸福而对颠倒的现实生活世界所进行的现实革命不仅是一场现实的革命,而且是一场理论的革命;不仅要改造不合理的旧世界、建立消除压迫和奴役的新世界,而且要实现新世界观的变革。

不仅如此,创造新世界的现实革命还需要一个承担者,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这一重任,而且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才能肩负起拯救整个人类社会的使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不是阶级的阶级”,它“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sup>[2]14</sup>。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sup>[3]62</sup>此外,这一现实革命的实现还需要把无产阶级和哲学家结合起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sup>[2]15</sup>。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人们要在马克思所处的现实生活世界中实现他们的现实幸福,只有付诸于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性实践活动,而且这一革命性实践活动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和哲学家的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实现。

### 三、历史性原则——给予现实批判 以根据的共产主义运动

既然人们只有通过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性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他们的现实幸福,那么使人们的现实幸福得以实现的“新世界”又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人们的现实幸福得以实现的“新世界”,是马克思的幸福观的理想社会形态。但是,关于共产主义具体什么样、能否真正实现,马克思则未加谈论,他拒绝谈论未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只是指出,“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sup>[1]31</sup>。尽管如此,马克思所谓“共产主义”明显具有双重内涵:作为形上诉求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和给予持续的现实批判以根据的共产主义运动。

其一,作为形上诉求的理想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既是人们的现实幸福的实现,又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统一的实现。如前文所言,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的实践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式的生存活动,它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在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中,人永远以自己的‘对象性’活动而实现自己的‘目的性’,人永远创造着自己和自己的世界,人本身和人所创造的世界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因此,人是世界上最奇异的存在——理想性的、超越性的、创造性的存在,即与世界否定性统一的存在,也就是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的存在。”<sup>[7]</sup>但是,在由“纯粹的金钱关系”和剥削关系所笼罩的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完全被异化的力量所奴役着,人的一切类本质和自由丧失殆尽,人们毫无幸福可言。基于此,人的否定现实、追求理想的形上本性促使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sup>[4]49-50</sup>,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进而建立起合乎人性的、使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共产主义;而且只有在这一理想社会形态中,人们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自由的人才能成为可能,人们的现实幸福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在共产主义中,“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它“表现在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中”<sup>[1]100</sup>;而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4]50</sup>。更重要的是,“只有共同体中,个人才能够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幸福)。”<sup>[8]</sup>所以,在共产主义中,幸福问题并不只是个人的幸福问题,还是全人类的幸福问题,而且

人们只有在实现全人类的现实幸福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现实幸福。换言之,在共产主义中,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实现了统一,这便是马克思哲学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关键所在。然而,这种基于人的形上本性的理想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正如“人本身和人所创造的世界”一样“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是人类的一种形上诉求和终极指向。

其二,虽然马克思拒绝谈论未来,不曾探讨过共产主义具体什么样、能否真正实现,但是作为形上诉求和终极指向的共产主义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既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也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一“现实的运动”的实现需要两个现实的前提:“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异化只有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它才能成为革命所反对的力量,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才会和资产阶级彻底对立起来;而异化要成为革命所对的力量,就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只有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下,才不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否则,必然导致“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sup>[1]30</sup>;而且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异化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不堪忍受的力量,才能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只有在上述实际前提都具备的情况下,共产主义才能成为在“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sup>[1]31</sup>。换言之,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是可能的。所以,共产主义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一种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所进行的“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尽管如此,学者们往往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进行传统形而上学式的目的论解读,将其当作人类应当实现的理想。其实不然,“马克思一贯坚持强调,人的‘目的性’和‘主体性’当中,存在着透视法的倒错”<sup>[9]</sup>;我们应该尝试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作后形而上学式的解读,即柄谷行人所谓的“事前性”解读。在马克思看来,“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诸种条件产生于现今所有的前提中,即构成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力量源于资本主义。所以,“共产主义并非‘建构性理念’——面向现实应当实现的什么理想,但可以是一个‘整合性理念’——给予持续的现实批判以根据的理想。”<sup>[10]</sup>换言之,就存在论而言,共产主义运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下转第26页)

构成性因素。这种对构成性因素的探索正是众多的后现代哲学流派所共同热衷的理论任务;反对先验,强调建构(包括主体的历史性建构)。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根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而正是这种从根本上强调建构性的理论态度反映了德勒兹的唯物主义立场,更具体地说,就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探索创造差异的可能性。因此,当我们骤然遭遇德勒兹的反辩证法的态度时,不但不应该从纯然拒绝的角度来看待,反而应该更深入地进入他思想的根源,用更具有当代性的视角来面对。

#### 参考文献:

[1] DELEUZE G.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M]. TOMLINSON H, Trans. London: Athlone, 1981:8-9,12,186.

(上接第8页)

的异化,“给予持续的现实批判以根据”;就政治哲学而言,共产主义运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灭了现存状况。更重要的是,既然构成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力量源于资本主义,那么这一共产主义运动必然具有历史内涵,它只是人的解放和复原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是必然的环节。同样,由共产主义运动所实现的“现实幸福”也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不是绝对的绝对,而是“相对之绝对”。所以,人们只能在坚持不懈地在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走向“共产主义”,实现他们的“相对之绝对”的现实幸福,而不能一劳永逸地实现人类的永恒幸福。基于此,我们只能把共产主义定位为马克思的幸福观的理想社会形态,而且人们只有在这种“给予持续的现实批判以根据的理想”的指导下,通过“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才能实现他们的“相对之绝对”的现实幸福。

####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

- [2] DELEUZE G, GUATTARI F. What is philosophy? [M]. London: Verso, 1994:2,38.
- [3] HARDT M. Gilles Deleuze: an apprenticeship in philosophy [M]. London:UCL Press,1993:ix.
- [4] DELEUZE G.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xxi,4.
- [5] ARMSTRONG A. Some reflections on Deleuze's Spinoza: composition and agency [M]//Deleuze and philosophy: The Difference Engineer. London: Routledge, 1997:47, 52.
- [6] DELEUZE G. The logic of sens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179.
- [7] ŽIŽEK S. Organs without Bodies: Deleuze and Consequences [M]. London: Routledge, 2004:52,94.

民出版社,2003.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3]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4]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列宁. 哲学笔记[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7] 孙正聿. 哲学的形而上学历险[J]. 天津社会科学,2011(5):12-17.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 [9] 柄谷行人. 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M]. 中田友美,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20.
- [10] 柄谷行人. 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M]. 赵京华,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82.